

邮票上的中秋



“月到中秋分外明”，每年农历八月十五日，是传统的中秋佳节。中秋节起源于远古，形成于汉唐，伴随着美丽的神话传说和千古流传的诗句，相沿至今，也成为邮票上表现的主题。



2002年9月21日，为庆祝“天上人间共团圆”的中秋节，中国邮政发行了主题为《中秋节》特种邮票一套3枚。这套邮票用传统的民间木版年画的艺术形式和独具韵味的单纯浅色印刷，

简洁明快地体现了中秋节月光融融、欢乐吉祥的气氛，方寸之间反映了人们的共同意愿。中秋节的主要活动都围绕“月”进行，因此3枚邮票图案中都绘有一轮明月。第一枚为《团圆》，图案为全家团圆品尝月饼的热闹场面，表达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期盼；第二枚为《赏月》，表现一家三口中秋赏月的情景。将清香的菊花、满堂的瓜果和仰望明月的人们融为一体，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喜悦，对风调雨顺的祈望，对亲人的祝福；第三枚《月为媒》，以月光下小溪旁一对互赠香囊的情侣，构成一幅情意绵绵的爱情画面。同时发行小版张，含全套邮票3套共9枚，边纸为祥云图。

2007年8月30日，中国邮政发行一枚《中秋祝福》专用普通邮资信封，这也是我国发行的唯一一枚以月亮为主图的邮资票品；2013年8月15日，中国邮政还发行一枚《团圆》个性化服务专用邮票，附票图案为嫦娥奔月。

我国港澳台三地邮政也都发行过有

关中秋节的邮票，设计元素当然也少不了中秋圆月。最早与中秋节有关的邮票，是台湾于1966年9月29日发行的《民俗邮票》中的第三枚，以中国传统绘画的形式，展现嫦娥奔月。1975年7月31日，香港发行《香港节日》邮票一套3枚，其中“中秋节”一枚用七巧板拼成了一幅花灯明月图，描绘出亮丽圆月下的金鱼灯，展现出人们手提灯彩、欢度中秋的热闹景象，这在所有中秋节邮票中也是画面最独特的。1994年6月8日香港发行的《中国的传统节日》邮票，其中第4枚“中秋节”主图为“嫦娥奔月”，这也是香港迄今唯一以年画形式设计的邮票。1981年10月1日，澳门发行《中秋节》邮票一套4枚，这是第一套真正为中秋节而推出的邮票，也是枚数最多的一套中秋邮票。每枚邮票的主图以宋体“秋”字为主图，分别配以嫦娥奔月灯、葫芦灯、八角灯、狮子灯，描绘出张挂灯彩、欢度中秋节的热闹画面。

箴言

菊井活人真寿客 斡山编辑老诗家

熊经浴

这是清·林则徐《赠名医何书田其伟联》。清·梁恭辰辑《楹联四话》卷一称：“青浦何书田茂才其伟，居北斡山（今作‘北干山’，位于上海市青浦区）下，工诗，家世能医，书田亦精其业，名满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抚吴时，得款脚病，何治之获痊，赠此联。”《清十大名家对联集》亦选入此联。

医生是人们健康的保护神。人们要健康与长寿，除了有良好的生活方式与卫生条件以外，富有仁心、医术精湛的医生的必要治疗与护理，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因此，“杏林春暖”“橘井泉清”的佳话历来传诵不绝。上联，巧妙地运用了“菊井活人”的传说。“菊井”当作“橘井”。晋·葛洪《神仙传·苏仙公》云：“苏仙公（苏耽），汉，桂阳人，以仁孝闻。文帝时得道，将仙去，告母曰：明年天下疾疫，庭中井水，檐边橘树，可以代养。井水一升，橘叶一枚，可疗一人。遂升云汉而去。至期果疫。母如言疗之，皆愈。”后因以“橘井”为良药之典。一说“菊井”即菊水，在今河南省内乡县。传说饮其水可长寿。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湍水》：“湍水之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洞山芳菊溪。源旁悉生菊草，潭润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饱长年。”这些传说虽不足信，但它记述的是医家心系患者，对病人的一片真情。“活人”，这里指为人治病。明·刘基《题医家王养蒙诗卷后》：“活人以为功者，医之道也。”“寿客”指菊花，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寒菊》：“然菊为寿客，自是耐久。”因为林公及其夫人曾接受过何氏的治疗，并取得好的疗效，所以用“菊井活人”之典故赞扬其医术，表达感激之情。

下联则进一步肯定名医何书田的儒学功底。林公《赠书田大兄联》云：读史有怀经世略，检方常著活人书。

在历史上，可以说“天下名医儒占多”。名医何书田即是如此，他不仅工诗，著医书，活人济世，而且因“医道通治道”，懂得经世之韬略。

唐朝：交通违规要打屁股

何宗

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丛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以故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一等。——《唐律疏议卷第二十六》

唐朝国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过百万，交通管制肯定是当时政府要抓的一项事务，如今的车辆违反规则要贴牛肉干，严重的吊销执照，在唐朝呢？牛肉干不会贴，不能得知，但打屁股是免不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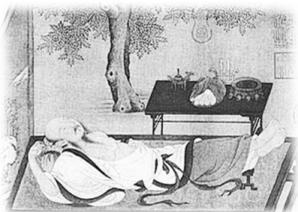
按照《唐律》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车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主板或者荆条打五十次屁股或脊背的处罚，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络聚集处，因此大发慈悲，改为打屁股，所以说这“笞五十”，打的应该是屁股。

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就对照殴打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

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唐朝交通法之中的“众”，是指三人以上。而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车的可以免于处理：政府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其实就是罚款。

现在我们晚上可以在家里看电视、打游戏、玩手机，还可以去外面打红酒绿，上KTV、酒吧，看电影、逛夜市……但你有想过古人从前是怎样过夜生活的呢？让我们从这些古诗词和字画中来看看古人的夜生活吧！

生活娱乐项目之睡觉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生活娱乐项目之找人下棋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从字画中看古人没有手机的慢生活

时化

生活娱乐项目之会友



闲居少邻并，草径入荒园。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

生活娱乐项目之叹气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生活娱乐项目之洗衣服



七夕乞巧，穿针引线，祈求姻缘。

生活娱乐项目之想媳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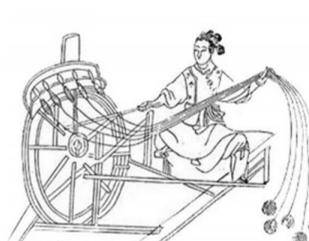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即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

秋风清，秋月明，落叶聚还散，寒鸦栖复惊。相思相见知何日，此时此夜难为情。

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长相思兮长相忆，短相思兮无穷极，早知如此绊人心，何如当初莫相识。

生活娱乐项目之织布



挂蓝的三彩赏析：宝相花之美

老妖



挂蓝的三彩洗

近年来，随着国内藏家与机构愈来愈多地进入国际拍卖市场，国内买家对艺术品的投资由早期的冲动逐渐趋于冷静，价格也一步步走向理性。今年春拍市场上，佳士得拍品《皿方罍》的回归与苏富比拍品《鸱首提梁壶》的意外流拍，极其富有戏剧性。对成交情况的观察，无疑是藏家判断市场走向的重要参考。

纵观刚刚结束的纽约苏富比春拍，虽然高古瓷所占比例不高，但有着非常

精彩的成交结果。四件唐代三彩成交三件，唐三彩钱柜更是拍出了329000美金。

另一件拍品，资料显示是拍主于1980年初购于香港的唐代三彩印花盘，口径25.4cm，估价15000—20000美金，成交价27500美金。该盘造型规整，盘内横印宝相花，施黄、蓝、白三色釉，盘心三支钉，并用补色遮盖支钉痕。

宝相花为我国传统装饰纹样，多为佛教题材。盛行于隋唐时期。此盘图案以填黄、蓝彩釉而成，使图案更具层次感，色彩对比强烈，极富装饰性。该盘由于采用了素烧工艺，胎体致密，色调清新淡雅。唐三彩的挂蓝在唐代首次出现，唐三彩器上挂蓝，往往被称为极品。藏界有“三彩挂蓝，价值连城”的说法。此三彩盘品相一流，较为少见，堪称唐三彩器中的精品。

唐代三彩器是中国陶瓷史上独特的品种。无论造型工艺，还是釉色装饰，都体现出大唐文化的雄浑博大，闪烁着盛唐时期的艺术风貌，我们在本次拍卖的拍品中也可略窥一二。

宋朝皇帝将足球列入朝廷礼仪中

黄亚明

《水浒传》有个高俅，是北宋末年足球侠。

高俅发迹之前，混在开封，陪一班公子哥们斗鸡走马，闹红灯，拉皮条，搞点风花雪月。后来犯事，挨了20脊杖，被逐出首都。几年后，哲宗大赦天下，形势一派大好。高俅回开封，多方投靠，但像个皮球，被踢来踢去。幸亏某日，小王督太尉差他去给端王赵佶送篋子刀。赵佶这文雅范，正在兴高采烈踢球，一脚踢到了高俅身边。高俅人混球，一时技痒，忘掉磕头，立马盘、带、推、拉，那蹴鞠像橡胶粘在脚上、身上。赵佶大喜，引为知己同道，当即派人传话给小王督太尉谢谢你的篋子刀，俺老赵连刀带人一并收下了。

不久，赵佶晋升为宋徽宗，坐龙椅，顺手扶了三高俅一把，高俅被破格提拔，成了大宋三军总司令。君臣从此不离不弃，演出了一场足坛双雄会。

皇帝赵佶的爱好非常广泛、伟大。作为中央书画院院长，其瘦金体书法独霸求败，工笔水墨富丽堂皇。作为国家诗词协会会长，其诗词风格、意境几可与南唐皇帝李煜媲美，来个哥俩好。作为美女集团闺蜜和计划生育破坏者，他一生创作了38个儿子、34个女儿（据《开封府状》）。作为骑马、射箭、箭花异石爱好者，接近专业水准。作为

国家足协主席兼球迷协会会长，不仅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在足球场上尽情奔驰，还利用公权力规定：凡朝廷有大型宴会，必须有足球表演赛；喝到第6杯酒时，足球运动员必须上场（据《东京梦华录》）。

赵佶的家族血脉里流淌着足球的基因。他的祖宗及子孙，包括赵匡胤、赵光义，均是足球狂人。《宋史》说，太平兴国五年三月，赵光义忽然春情勃发，带一班亲王、宰相、准海国王、近臣，在庄肃的大明殿举办了一场足球友谊赛；隆兴四年九月，孝宗赵存坐在选德殿，兴致勃勃地检阅了一场足球邀请赛。《武林旧事》说，宋理宗赵昀过生日，举国大庆，举行了一场足球祝寿赛，参赛队员达24人，包括陆宝等超级球星。

这充分说明，宋朝的足球氛围热烈健康，积极向上，只要练好蹴鞠技，货与帝王家，可以彻底改变命运，飞黄腾达，发家致富。

在一大批批前赴后继投资球市的俱乐部老板里面，多一些赵佶这种文艺而多金，颇具浪漫情怀的球迷型东家，是带领中国足球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希望所在。赵佶还建议中国足协办公室，悬挂赵佶同志的画像，日日观瞻，以纪念吾国足球运动的推动者和开拓性导师。

文史知识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 宋朝时最“拉风”

宗合

科举，是中国历史上独有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科举制对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俗乃至民族性格的深刻广泛影响，很少有一种制度能够与它相比。比如，深深渗透到中国人思想和血液中的状元文化就是一例。

现代高考制度和过去的科举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然而文化的血脉是无法割断的。延续了1300多年之久的科举文化对中国人思想的潜移默化影响，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我们都无法回避。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

中国历史上的科举制度，自隋唐开始施行，直到清末废止，其间除了蒙元初期的几十年停止了一段，无论是历时长久的统一王朝，还是不断更迭的五代十国；无论是汉族人建立的帝国，还是少数民族政权，一直沿用了1300多年之久。

中国古代选拔人才，秦以前的商周时代主要是贵族世袭制，战国时诸侯纷争，得人才者昌，出现过下级士族及庶民大量登上政治舞台的现象。两汉时代主要行“察举制”，就是定期由郡国长官听取“乡举里选”的意见，考察辖区内的才子，推荐给中央去做官。魏晋南北朝时，察举演化为“九品中正制”，察举大权完全掌握在各地的豪门世族手中，以致弊端丛生，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这种非常有害于人才发展的局面。

隋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地方豪族把持察举的特权，“九品中正制”渐废，开始试验由中央设科目，地方举人考，经考试后入仕的作法，这就是科举制度的开端。又因为隋场举喜文学，他始设的“进士科”后来成了科举考试中最重要的一科。

唐代“选士多因隋制”，初期科目之名繁多，据清代学者顾炎武《日知录》统计，“见于史者凡50余科”，是名副其实的“设科取士”、“分科举人”。武则天以后，每年常规考选的科目，只有“进士”和“明经”两科了。宋代王安石变法后，只留下了进士一科，元、明、清相沿不变。

“状元”一词始于唐代。凡举人进京会试，须先到礼部投状报到，故时人称进士第一名为状元，又称状头。唐高祖武德五年(622)朝廷开办贡举，考取进士十四人，第一名是孙伏伽，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

唐代的状元还不像后世那样受人艳羡。唐代状元并不为史书所特别记录，两《唐书》里有传的状元，如王维、柳公权、李固言，只称“中进士第”，并不强调其状元头衔。而且，唐代考中状元也和其他进士一样，只有再通过吏部试才能入仕做官。

唐代状元没有高出一般进士之上的特殊荣誉，这和当时的考试与录取方式等很有关系。状元既不是像宋代那样由皇帝经殿试“钦点”，也不是全凭考场上的答卷定名次，通常是由考官决定。而考官受人请托和接受推荐，取谁为状元都属正常现象。

“关节状元”受尽嘲讽

唐代科举，考试和录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谓通关节，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约定，用不着在考场内、答卷上或在阅卷时作弊，虽不正大光明，却也不违法。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状元，他父亲杨廷和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杨慎是现任宰相之子中状元的第一例。虽也曾引起一些窃窃私语，如有人说，殿试首席阅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策题告诉了杨慎，杨慎才“应对独详”，但杨慎的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素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杨慎父子以“议大礼”而获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议者的口。

但是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引起的议论可就纷繁复杂，导致的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了。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结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

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懋修考中举人。这并不算稀奇，到此为止人们也不会说什么。然而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这样的先例，以致后来万历二十年前后的首辅沈一贯，为了避嫌，竟让本来很有才华的儿子沈泰鸣放弃科考。沈泰鸣对此不能理解，结果父子反目成仇。

“卷外因素”不可忽视

在状元录取中，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科举时代，有时因一个名字，竟关乎得失，系于祸福。

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某怎能做状元。古人直行书写，曰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最后按皇上的意思，将第三名的邢宽点为状元。朱棣为什么忌讳这个暴字而推崇宽字？这有很深的心理因素。因为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四个儿子，他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是通过阴谋和武力而夺取皇位的，因为害怕别人说他残暴，所以对暴字有特殊的敏感。他力图在晚年树立一个宽厚仁慈的形象，邢宽因此得了便宜。因为朱棣认为，邢宽这个名字隐含着“刑放宽和”的意思。

也有投机取巧、临时改名的。当咸丰皇帝即位时，有位应试的孙姓举人立即悄悄改名为“孙庆咸”。开科后，虽然他的文章平平，但考官看见这个名字好，为博新主子欢心，遂将他取为会试第一名。

名字取得好不好很重要，相貌长得帅不帅关键时刻也会成为决定因素。洪武四年(1371)，明朝举行开国后的第一次科举考试。本来拟定郭冲为状元，可是朱元璋觉得此人貌不惊人，不足以显示大明帝国的新兴气象，于是将气宇轩昂、相貌堂堂的吴伯宗点为状元，“以壮国威”。

明弘治十二年(1499)殿试，原定浙江人丰熙为第一名，但因为丰熙一只脚有毛病，就改选广东南海相貌不俗的伦文叙为状元。但丰熙的对策写得很出色，皇帝十分赞赏，就定他为一甲第二名，却赐同状元及第，作为安慰。丰熙成为戴状元冠的副状元，千古仅此一例。

宋朝科举最为“拉风”

自宋太祖禁止公荐，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取舍。宋真宗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考试规则，试卷糊名弥封，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受请托、受贿或是爱才，要想预定录取谁，都不能公开进行了，完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来决定录取与否。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殿试，由皇帝定状元。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他选定的第一名门生当然重要。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与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很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誉。新进士录取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服以下无不胜观望，连皇帝也注目礼。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兵打仗，秦凯还师的将军回京，场面也不及此。

宋代科举，起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宗正式规定，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成为定制，为历代所遵循。

北宋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已经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唐朝杏园的探花宴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